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研究*

王 阳 赵海珠

【摘 要】文章使用 1990~2020 年宏观数据,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进行测度,继而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有所收窄,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第一产业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分因素看,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程度加深会加剧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且作用依次递减;而城镇化、市场化、投资与消费增长和科技进步会改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且作用依次递减。文章认为,要化解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须以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冗余及配置低效为突破口,抓住“十四五”时期乃至 2030 年前后的关键时间窗口期,科学分析,综合施策,充分发挥有利因素作用,最大程度扭转不利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就业结构 产业结构 就业结构性失衡 结构偏离度 影响因素

【作 者】王 阳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海珠 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一、引 言

就业结构是劳动生产要素在部门与产业间配置的反映。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内在要求。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就业结构变化带动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与此同时,劳动力收入和素质提高又对产业升级构成有力支撑。近年来,中国积极提升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扩张与重构,实现了产业结构快速升级。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就业结构调整的进程滞后于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第一产业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高于其产值比重,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前,中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同时面临消费需求结构性不足、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放缓、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等不利条件,有必要继续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强化

* 本文为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2021 年度课题“‘十四五’时期我国青年就业结构性失衡及应对举措研究”(批准号:21ZL003)的阶段性成果。

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支撑,形成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提高满足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在此背景下,就业结构的滞后变动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对高质量发展阶段下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造成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因素,认清和把握应对思路 and 措施路径,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加快就业结构调整优化。

围绕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现有文献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分析。Syrquin 等(1989)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结构变动更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并且滞后状况在短期内较突出。Knight 等(2011)认为,受产业间收入差距驱使,劳动力逐步由农业向工业及服务业转移,从长期看,就业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一致性。任波、黄海燕(2020)指出,产业结构失衡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不协调的根本原因。由于缺少新要素、新技术、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的第二、第三产业以传统制造业与低端服务业为主,产业升级发展缓慢,制约了就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的进程。Majid(2021)也认为,大城市及服务业是移民劳动力的重要接受者,就业结构将以三产为主。Anzolin(2021)则指出,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变化影响就业结构,技术进步推动相关产业和行业就业扩张及比重提高。

二是对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现状分析。廖添土、葛格(2019)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动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且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陈刚等(2019)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传统制造业就业净流出速度增加,但是新兴制造业就业净流入增速相对缓慢,导致制造业整体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同时,传统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但是现代服务业受生产规模不足、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等因素影响就业吸纳能力不强,难以弥补传统行业就业吸纳能力的下降幅度,导致服务业整体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宋锦、李曦晨(2019)提出,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偏低,尽管第二产业在多种有利因素推动下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其就业吸纳能力偏低,而第三产业依然处在发展壮大阶段,难以担当吸纳转移劳动力的重任。冀强、巴森达西(2020)指出,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快于中西部地区,前者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更为平衡,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状况突出。

三是对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理论研究显示,城乡区域二元结构及技术进步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徐波等(2019)认为,工业化主导战略推动中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但受教育水平偏低、人力资本不足造成高素质人才短缺,加之城乡区域二元结构尚存,劳动力、人才流动不充分,造成就业结构调整迟缓。Feng(2020)提出,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高科技行业就业扩张,使低技术工人、高校毕业生、新生代农民工等市场新求职人员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同时,制造业中低端

岗位的人员流动性较大,企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低,加剧了制造业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劳动力短缺,影响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实证研究显示,多重因素造成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张抗私、周晓蒙(2014)提出工业化水平、技术水平及对外开放水平等因素。孙雨露等(2018)提出人力资本、城镇化、消费和投资及市场化等影响因素。夏四友等(2020)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外商投资和消费水平等因素。王月婷(2021)提出研发经费投入、工业化程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和城镇化率等因素。

已有文献大多聚焦个别省域,且考虑因素以需求侧为主,综合考量供给侧、需求侧和市场环境等多方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已有文献鲜少分析造成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对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同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宏观层面各结构性因素的有效观察指标也未能形成统一的观点。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建设、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需要研判人口结构变化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描述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变化趋势的基础上,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识别造成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直接原因和重要的间接原因,前者为来自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后者为来自宏观大系统、包括供给侧、需求侧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二、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描述性测度

结构偏离度法是描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协调性程度的一种量化方法,可以定量描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失衡状况。结构偏离度的计算公式为:

$$Y_k = \frac{val_k}{emp_k} - 1 \quad (k=1, 2, 3)$$

其中, $k=1, 2, 3$ 分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Y_k 表示第 k 产业的结构偏离度, val_k 表示第 k 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emp_k 表示第 k 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

当结构偏离度大于或小于0时,说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如果结构偏离度大于0,即产业增加值比重大于该产业的就业比重,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吸纳就业能力强,但就业不充分;反之,如果结构偏离度小于0,产业增加值比重小于该产业的就业比重,意味着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吸纳就业能力弱,但就业规模较大,需要向其他产业转移冗余的劳动力。当结构偏离度等于0时,说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达到协调程度,二者之间不存在失衡状况。在完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结构偏离度趋近于0。但在现实的市场条件下,受政府干预、体制机制壁垒等因素的影响,结构偏离度往往大

于 0 或小于 0, 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处于某种不协调状态, 即存在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为此, 根据结构偏离度的计算公式, 得到 1990 年以来中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见图), 总体看, 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均呈现向横坐标靠近的变动趋势, 表明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均有所收窄, 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程度提高, 失衡状况得到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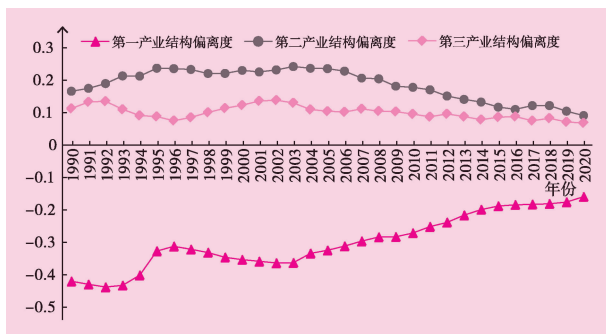


图 1990~2020 年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状况

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最大, 且始终为负值。随着产业升级和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 部分农业富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并在城镇稳定下来, 推动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改善。然而, 受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等影响, 城乡区域劳动力要素配置不够合理, 第一产业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 劳动生产率偏低。1990 年以后, 第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呈震荡趋向 0 的趋势, 1990 年为 -0.42, 2020 年为 -0.16, 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收敛了 0.26。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仅次于第一产业, 且始终为正值。由于实施工业化战略, 中国第二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展现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及强大的吸纳就业能力。1990~2008 年,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逐步攀升并在高位徘徊, 2003 年达到高点 0.24。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部分制造业企业向国外转移,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开始收窄, 就业吸纳能力下降。2008 年,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为 0.20, 2016 年降至 0.11, 在经历 2017~2018 年的小幅回升后, 2020 年进一步降至 0.09。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绝对值最小, 也始终为正值。过去 30 多年, 中国第三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结构加快升级, 2011 年成为吸纳就业量最大的产业。随着服务领域拓展、服务品种丰富和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中国服务业大国地位已确立, 吸纳就业潜能得到释放。1990~2004 年,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呈现大幅震荡态势, 最高点达 0.14 (2002 年), 最低点仅 0.08 (1996 年), 2005 年以后,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呈现小幅震荡下降态势, 2010 年降至 0.10 以下, 2019 年降至 0.08 以下, 2020 年为 0.07。

三、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 模型和指标

1. 实证模型

偏最小二乘法是一种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回归建模方法, 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各个细分研究领域。该方法可以避免主成分回归中相关性很小时变量易被遗漏的问题,

且能规避模型不可识别的问题,对样本量要求较少。本文采用多次多元线性回归构建最小二乘通径模型,包括外部和内部两组模型。假设显变量为 J 组,每组显变量含有变量 p_i 个,则每组显变量为: $X_j=(x_{j1}, x_{j2}, \dots, x_{jp_i}), j=(1, 2, \dots, J)$ 。设定显变量 x_{jh} 是中心化的,且基于 n 个共同观测点,每组显变量 X_j 对应的潜变量 $\xi_j(j=1, 2, \dots, J)$ 是标准化的。

外部模型用于解释潜变量与显变量的关系: $x_{jh}=\lambda_{jh}\xi_j+\varepsilon_{jh}$, 其中, ε_{jh} 表示均值为 0 的随机误差项。内部模型用于解释潜变量间的关系: $\xi_{jh}=\sum_{i \neq j} \beta_{ij}\xi_i+\zeta_j$, 其中, ζ_j 表示均值为 0 的随机误差项。

2. 指标选择

模型的主要潜变量即被解释变量为结构偏离度,其对应 3 个主要显变量分别为三次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建立就业产业结构性失衡影响因素各潜变量和显变量的指标体系,综合已有文献和实际应用,本文中指标的统计学含义为:(1)经济发展程度。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越高,各产业的发展潜力越大,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就越强,反之亦然。同时,第二产业发展对中国经济运行保持长期稳定起重要支撑作用,因而对稳就业也发挥着关键的带动作用。而第三产业的产值近年来逐渐超越第二产业,且在传统部门具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因此,选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取对数)、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度量经济发展程度。(2)对外开放程度。外商投资与对外贸易不仅直接促进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还通过资本输入和技术外溢提升国内劳动力素质,使就业结构得到优化。因此,选择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外资投资额(即港澳台投资经济的投资额与外商投资经济的投资额的合计数)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取对数)度量对外开放程度。(3)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源素质的高低决定投入到产业发展中的智力供给水平和质量,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继而影响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因此,选择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数(即本专科毕业生数与研究生毕业生数的合计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取对数)度量人力资本水平。(4)科技水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但是,科技进步对就业岗位规模兼具创造效应和毁灭效应,对就业岗位的分布和结构也会产生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因此,选择研发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取对数)、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取对数)度量科技水平。(5)市场化程度。市场因素在各种生产要素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熟的市场调节机制可以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扩展就业空间,增加就业渠道,还可以调整劳动报酬水平和缩小初次分配差距,促进劳动力要素在产业和行业间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选择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差值)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非国有经济单位从业人员(即

城镇港澳台及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城镇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的合计数)占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两个指标度量市场化程度。(6)投资与消费水平。投资和消费保持恰当的关系是支持经济增长尤其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长期以来,工业化的主导战略决定投资对中国经济的主导作用,而内需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足,两者间的不平衡造成产业间产能过剩与发展不足并存,影响三次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因此,选择投资率(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和住户部门总储蓄额度(取对数)度量投资与消费水平。(7)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发展促使大量农业富余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形成人口和产业在城镇地区集聚和生产的规模效应,细化社会分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城镇化为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在城镇就业的机会,也为其定居城镇、完成市民化转型创造了条件。因此,选择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常住人口数占总人口数比重)和就业城镇化率(即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度量城镇化水平。(8)老龄化程度。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较为复杂。老龄化程度影响产业发展可利用的人力资源规模和质量,老龄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制造、医疗、文旅、康养、体育、管理等一系列产业行业就业需求倍增。因此,选择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老年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度量老龄化程度。

本文选取 1990~2020 年国家层面的数据。绝大部分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投资领域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

统计年鉴》等公开出版物,“住户部门总储蓄额度”指标的原始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此外,对于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二) 模型评价

1. 交叉因子载荷及通径系数检验

交叉因子载荷及通径系数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从中可以看出,显变

表 1 PLS 通径分析模型的交叉因子载荷及通径系数检验

变 量	外部模型 载荷	变 量	外部模型 载荷
经济发展程度(1.333)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0.996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917	市场化程度(0.020)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	-0.704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0.915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0.988	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比	0.967
对外开放程度(-0.196)		投资与消费水平(-0.596)	
外贸出口额占 GDP 比重	-0.300	投资率	0.945
外资投资额占比	-0.624	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	0.813
实际利用外资额	-0.934	住户部门总储蓄额度	0.923
人力资本水平(1.018)		城镇化水平(-4.034)	
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0.976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996
高校毕业生占比	0.968	就业城镇化率	0.997
每十万人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0.984	老龄化程度(-0.101)	
科技水平(1.375)		老年人口比重	0.993
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0.993	老年人口抚养比	0.980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0.997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	0.935

注: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得到。括号内数据为与就业产业结构偏离度的通径系数。

量“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与对应的潜变量“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显变量“外贸出口额占GDP比重”“外资投资额占比”和“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对应的潜变量“对外开放程度”的载荷系数均小于0.7,相关性不明显。因此,剔除上述4个显变量和1个潜变量,形成新的指标体系,并再次进行交叉因子载荷及通径系数检验,结果证实符合模型要求,调整后的显变量与潜变量的载荷系数均大于0.7。

2. 信度及效度评价

表2 PLS 通径分析信度及效度评价

变 量	负载 系数	Cronbach's Alpha 值	rho_A 值	组合信度 (CR)	平均抽取 变异量(AVE)
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	-0.942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	0.869	-2.525	0.875	0.708	0.797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	0.865				
经济发展程度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0.987	0.971	0.972	0.986	0.972
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0.986				
人力资本水平					
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0.984				
高校毕业生占比	0.968	0.976	0.995	0.984	0.953
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0.984				
科技水平					
研发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0.993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0.997	0.995	0.998	0.997	0.991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0.996				
市场化程度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0.915	0.878	1.018	0.940	0.887
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比	0.967				
投资与消费水平					
投资率	0.945				
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	0.837	0.874	0.878	0.924	0.802
住户部门总储蓄额度	0.923				
城镇化水平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0.996	0.993	1.000	0.996	0.993
就业城镇化率	0.997				
老龄化程度					
老年人口比重	0.993				
老年抚养比	0.980	0.968	0.978	0.979	0.940
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年龄	0.935				

注: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得到。

对模型内部一致性信度及收敛效度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Cronbach's Alpha 值、rho_A 值、组合信度 (CR) 和平均方差抽取变异量 (AVE)。如果平均方差抽取变异量大于 0.5, 其他指标大于 0.7, 说明模型内部收敛效度较高。表 2 结果表明, 本文建立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因素偏最小二乘通径分析模型中各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负载系数较高, 模型内部一致性较好, 收敛效度

较好,模型效果符合要求。

3. 判别效度分析

每个潜变量对应的测项指标组应与其他潜变量对应的测项指标组之间不存在相关性,从而证明潜变量之间、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对应的测项指标之间具有判别效度。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3 所示,每个潜变量的 Fornell-Larcker Criterion 值(位于对角线的数值)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对应的测项指标的相关性,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三) 结果分析

在经过调整的通路模型中,各个潜变量与 Y 的通路系数均显著,且拟合精度高,可决系数 $R^2=0.965$ 。使用偏最小二乘法对显变量和潜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取得显变量的外部权重系数(见表 4)。

1.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直接效应

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产生显著影响。从影响程度看,第一产业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从影响方向上看,第一产业影响为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正。表 4 结果显示,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与 Y 的通路系数为 -0.942,表明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每增加 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改善 0.942%;

表 3 潜变量间相关系数

	Y	X ₁	X ₃	X ₄	X ₅	X ₆	X ₇	X ₈
Y	0.893							
X ₁	-0.783	0.986						
X ₃	-0.804	0.974	0.977					
X ₄	-0.867	0.980	0.959	0.995				
X ₅	-0.828	0.972	0.969	0.965	0.975			
X ₆	-0.925	0.926	0.900	0.938	0.911	0.946		
X ₇	-0.890	0.983	0.976	0.977	0.926	0.886	0.996	
X ₈	-0.879	0.970	0.934	0.963	0.933	0.918	0.971	0.973

注:对角线为 Fornell-Larcker Criterion 值。

表 4 通路系数及显变量外部权重

变 量	外部权重	变 量	外部权重
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0.942)	-0.393	市场化程度(-1.056)	
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0.865)	0.366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0.408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0.869)	0.360	非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占比	0.648
经济发展程度(2.565)		投资与消费水平(-0.322)	
人均 GDP	0.516	投资率	0.371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0.498	工资总额占 GDP 比重	0.375
人力资本水平(1.403)		住户部门总储蓄额	0.373
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	0.306	城镇化水平(-3.327)	
高校毕业生数占比	0.396	城镇化率	0.487
每十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	0.322	就业城镇化率	0.516
科技水平(-0.225)		老龄化程度(0.083)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0.322	老年人口比重	0.365
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	0.335	老年人口抚养比	0.361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	0.348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	0.304

注:括号内数据为与 Y 的通路系数。

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与Y的通径系数为0.869,表明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每增加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加剧0.869%;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与Y的通径系数为0.865,表明第二产业结构偏离度每增加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加剧0.865%。可见,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共同造成中国整体的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其中,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是首要原因,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是第二大原因,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是第三大原因。

现阶段,中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富余劳动力多。要化解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须以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冗余及配置低效为突破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高,但存在吸纳就业不足的问题,第三产业影响更大。要化解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问题,须以解决两大产业普通劳动力及高层次人才短缺为突破口。当前,中国总体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些中西部省份工业化发展不充分,仍需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应当保持就业总体稳定,从而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人力资源支撑和协同。与之相似,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同样面临就业不充分、人才支撑弱的挑战,健康、养老、育幼等生活性服务业劳动力紧缺,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区域性人才流失,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领域国际化人才流动受阻。“十四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内,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就业潜力大、空间广,着力加强劳动力和人才充分供给、精准匹配,对改善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十分关键。

2. 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间接效应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老龄化程度均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最大,人力资本水平次之,老龄化程度最小。表4结果显示,经济发展程度与Y的通径系数为2.565,人力资本水平与Y的通径系数为1.403,老龄化程度与Y的通径系数为0.083,表明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分别加剧2.565%、1.403%和0.083%。可见,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和老龄化程度是加剧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三大主因,要化解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须着力分析和解决三大因素中不利于就业与产业实现结构均衡的问题,如增加无效岗位、输出低素质、低技能劳动力,以及拉大劳动力供需缺口等。具体而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实力巩固提升,第三产业增加值快速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未能同步带来就业吸纳能力的提高,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始终低于美、英、德、法和日等发达国家。同时,教育培训体系不能满足产业发展需要,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比不高,高级技工缺口超过2000万,中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与企业需求存在鸿沟,毕业生因训练不足难以得到好的就业机会,大量中低素质技能的劳动力难以被新兴

产业、现代服务业充分吸收。此外,老年人口比重攀升带动制造业、医疗、文旅、康养、运动、管理等行业发展,也扩大了就业缺口。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就业人口平均年龄提高,接受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能力下降,青年劳动力减少与就业市场的“需求偏好”形成矛盾都在加剧劳动力供求失衡。老年人口抚养比攀升“挤占”部分家庭和社会资源,增加企业和个人税负,阻碍社会创新,不利于产业升级。

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投资与消费水平和科技水平均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市场化程度次之,投资与消费水平再次之,科技水平最小。实证结果显示,城镇化水平与 Y 的通径系数为 -3.327 ,市场化程度与 Y 的通径系数为 -1.056 ,投资与消费水平与 Y 的通径系数为 -0.322 ,科技水平与 Y 的通径系数为 -0.225 (见表4),表明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投资与消费水平和科技水平每增加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分别改善3.327%、1.056%、0.322%和0.225%。可见,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投资与消费水平和科技水平是改善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四大主因。要化解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须充分发挥四大因素的有利条件,同时,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短板和问题。具体而言,在城镇化水平方面,存在公共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低、农业转移人口在常住地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等问题,不利于发展成果的共享,阻碍了人的城镇化。由于难以在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外来人口难以在城市扎根,实现稳定居住和稳定就业。在市场化程度方面,存在市场准入和退出渠道不通畅、市场竞争不充分等问题,民间资本进入能源、电信、铁路、金融、市政、教育、卫生等行业,市场准入方面还有限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国有企业在融资能力,以及土地、劳动力使用、人才吸引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影响了竞争的公平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在投资与消费水平方面,存在部分领域投资门槛过高、部分地区投融资环境不佳、劳动者收入相对下降、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企业资本支出意愿不足,居民消费倾向下降,不利于形成高效率投资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科技水平方面,存在创新绩效和产出效率不高、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人才激励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不利于形成产学研有效互补的全社会创新生态。企业研发活动规模偏小、投入强度偏低,创新活力难以被有效激发。对科研人员和高技能人才激励措施不到位,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与国际接轨的科研氛围、可持续的科研设施保障,以及一些大城市难以回避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还有缺位。

四、结论及建议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研究显示,

改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协调性状况,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因此,运用政策手段干预就业与产业结构偏差,加速二者实现结构均衡的过程,是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研究发现:(1)长期以来,中国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动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共同造成全国整体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1990年以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状况呈现改善趋势,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均向0趋近,表明三次产业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偏差都有所收敛。(2)第一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是造成全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首要原因,第三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是第二大原因,第二产业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是第三大原因。(3)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低,富余劳动力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高,但是吸纳就业不足。要化解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须以解决第一产业劳动力冗余及配置低效为突破口。(4)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本水平、老龄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投资与消费水平和科技水平,是造成全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七个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程度对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作用大小依次递减;而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投资与消费水平和科技水平均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且作用大小依次递减。(5)要化解中国整体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须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和老龄化程度等三大因素中不利于就业与产业实现结构均衡的问题。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投资与消费水平和科技水平等四大因素的有利条件,着力补短板。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充分释放农业劳动力。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类型正向节约劳动型转变,对于释放农业劳动力还有较大潜力。应当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在农业内部发展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并有竞争力的产业,提高农业效益。(2)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拓展非农就业空间。加快推进县域城镇化,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加强乡镇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基地建设,吸纳农民入乡镇入基地就业。吸引非农产业向县域和有发展条件的农村乡镇布局,支持城市大中企业将生产实体向县域和乡镇转移延伸,加强加工集群及物流骨干网络、冷链物流体系建设。(3)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增强人力资源的支撑和协同作用。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强大规模生产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可重构生产系统和以工业物联网为核心的现代制造系统的战略部署。提高科技投入水平,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促进科技对新型产业就业的带动作用。(4)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主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法规政策,破除垄断部门的优势地位,引导保护非国有经济发展,着力提高非公经济就业质

量,使其在分流第一产业乃至转型升级后的部分第二产业的富余就业人口中起主要作用。(5)落实落细稳投资、促消费政策,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社会民生领域投资提速,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和外资向第三产业布局,优化投资结构。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合理配置,提高投资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政策,健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机制,缩小地区、城乡和收入差距,持续改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意愿。(6)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相关改革,激发各类主体活力和创新力。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配套政策等落实情况督导,加大“钱随人走、地随人走”政策力度。适度降低政府投资性支出,坚持财政资金向公共消费领域转移,提高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养老和育幼等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完善就业保护和社会保护制度,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镇稳定就业。

参考文献:

1. 陈刚等(2019):《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协调性分析——基于广州市的实证检验与横向比较》,《中国经贸导刊》,第2期。
2. 冀强、巴森达西(2020):《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研究》,《河南社会科学》,第11期。
3. 廖添土、葛格(2019):《福建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耦合效应分析》,《经济研究参考》,第11期。
4. 任波、黄海燕(2020):《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与供给侧破解路径》,《体育学研究》,第1期。
5. 宋锦、李曦晨(2019):《产业转型与就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6. 孙雨露等(2018):《云南省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的数量分析》,《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0期。
7. 王月婷(2021):《浙江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现代管理科学》,第3期。
8. 夏四友等(2020):《中国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时空格局演化》,《华东经济管理》,第5期。
9. 徐波等(2019):《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进及动态测度》,《统计与决策》,第18期。
10. 张抗私、周晓蒙(2014):《就业结构缘何滞后于产业转型:人力资本视角的微观解释——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6期。
11. Anzolin G. (2021), Automation and its Employment Effect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utomotive and Garment Sectors. Background Paper Series of the Joint EU-ILO Project “Building Partnerships on the Future of Work”.
12. Feng X. (2020), The Labour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in China. ILO Publishing.
13. Knight J., Deng Q., LI S. (2011), The Puzzle of Migrant Labour Shortage and Rural Labour Surplus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2(4):585-600.
14. Majid N. (2021), Employment, Labour Force and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n India 2000-2019. ILO Research Brief.
15. Syrquin M., Chenery H. (1989),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2): 145-181.

(责任编辑:李玉柱)